

貞下起元

陳東

「五四」文化運動的重大意義的結果之一，是把對儒家文化的批判與否定樹立為一個不言自明的正面價值，使之成為整個二十世紀文化運動的主題和基調，從而使得反傳統主義成了後來知識分子的共同精神遺產。從民初的「倫理革命」，到70年代的「批孔批儒」，乃至80年代後期對儒家的文化批判，無可懷疑地顯示出，二十世紀文化運動是受激進主義所主導的。在還不到百年的時間內，進步、革命、科學、啟蒙一直是最具魅力的口號。摒棄傳統成為先進知識分子所以先進的表徵，所有對儒學內在弊病的可能批判都被充分地挖掘並高揚起來，健康、合理的剖析與蠻橫、荒誕的斥罵，互相交叉，各詣其極。儒家思想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秩序中傷痕累累地從中心退到了邊緣。這不僅是世界範圍內現代性的擴張和西方文化的侵逼所致，也是中國知識分子自覺自願和為國為民的選擇。

然而，至少從西周到孔子，中國文化從巫術的意識形態已穩定地發展出獨特的、成熟的民族精神形態。儒家的強烈的人文價值理性，規定了中國文化展開的方向和路徑，造就了中國文化的精神氣質。這種精神氣質決不是少數批判的武器所能消解，它的內在價值也不因短期的工具性成敗而受到根本影響。作為一個持續兩千多年的精神傳統，它透過所有書寫文字與口頭傳播已經成了中國人存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70年代後，工業東亞的經濟奇迹對傳統現代化



理論構成了重要挑戰，學術界對啟蒙心態的反思為傳統延續的合理性提供了哲學、思想的支持，理性化的展開顯示出愈來愈多的限制和代價。這一切使得即使是反傳統的知識分子也開始意識到，儒家傳統不必是中國現代化的根本障礙，現代化的過程可以在採取不摧毀傳統的方式下實現，傳統的調整和持續與制度的改革和建構可以整合在同一過程之中。而破壞傳統不僅不必然地意味現代化的實現，卻可能導致價值結構的解體與文化認同的失落，損害到現代化秩序建構過程本身。歷史表明，大規模有效的社會變革，不可能在與成員共同的文化取向根本衝突的方式下實現，任何一個運動或社會工程必須適應或恰當地運用固有精神資源。而歸根到柢，包括儒學在內的實質合理性傳統是社會及人本身存在不可或缺的需要。

因此，雖然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在二十世紀知識分子從文化啟蒙、經濟功能、政治民主等全方位的批判中，經歷了兩千多年來最為嚴峻的考驗，但是，站在二十世紀即將走過的今天，放眼儒家文化的未來命運，沒有理由絕望或悲觀。恰恰相反，我確信，在經歷了百年以來(特別是最近一次)的挑戰和衝擊之後，儒學已經度過了最困難的時刻，已經走出了低谷。這使我常常想到馮友蘭「貞元之際」的提法和「舊邦新命」的信念。無論二十一世紀前半紀的歷史如何行進，二十一世紀後半紀必將迎來整個儒家文化地區的強勁發展，儒家思想與中國文化必然隨之重新活躍。這種中衰傳統的復興，正如席爾斯所說，當然不意味着對社會中心的重新征服。但毫無疑問，這有助於擺脫漂泊不定的搖擺，使中國文化在多元性發展中具有一種統一的氣質作為穩定的基礎。

在這個意義上，「貞下起元」不僅適於世紀之交的時間輪續，而且是文化生命一陽轉復的象徵；處在貞元之際的知識分子則須反省二十世紀的激進與浮躁，從儒家「變化氣質」的老話入手，在繼續文化批判與文化引進的同時，沉潛於文化建設，以負擔起繼往開來的使命。

陳來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